

西方普遍模式的批判性反思

——工业革命与扩散主义

全洪爽 沈若梦*

浙江工商大学

DOI:10.12238/ej.v7i9.1872

[摘要] 经济史的主题就是为了说明国家财富的本质和形成要因。工业革命是指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停滞的传统经济向近现代工业经济变革的过程,它实现了生产量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现代化的扩散主义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即将世界各地的人类集团分为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等文明等级论也有共生关系。与此相关,本文在近现代世界经济(现代世界体系)的层面,讨论了以“比较经济史”为论题展开的西方模式、工业革命、扩散主义、大分流等概念和理论。

[关键词] 西方普遍模式; 经济史; 大分流; 工业革命; 扩散主义

中图分类号: K561.43 文献标识码: A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Western Universal Paradig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Diffusionism

Jeon Hong-seok Ruomeng She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ubject of economic history is to illustrate the natur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d the main causes of its formati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change from a traditional economy with stagnant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o a modern industrial economy, which achieved an increase in the volume of production, an increase 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There is also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usionism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the civilizational hierarchies that underpin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e., the classification of human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into barbarism, obscurantism, semi-enlightenment, civilization, and so on. In this connec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the Western mode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ffusionism,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under the rubric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Key words] universal western model; economic history; great divid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ffusionism

引言

经济史被称为社会科学王冠上的钻石。经济史的主题就是为了说明国家财富的本质和形成要因,为了完成这一课题,经济史家们在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不断进行探索。在这种视角的延续下,最近东西方比较经济史的核心内容是以现代世界的特征和西方优势的特征——工业化、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化(modernization, 近代化)的大规模历史进程为争论中心,阐明西方开始超越其他大陆的时点和其他区域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与近现代国家机制相结合的西方普遍模式(欧洲中心主义体

系)中,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是在十八世纪后半叶具备了基本的雏形,同时资本主义的践行对于理论的建立提出要求并直接推动了其自身的形成。之后,在十九世纪其发展达到了顶峰,一直到今天还在持续对非西方地区产生着令人恐怖的破坏力。通常认为,尽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在1500年前后,而与其并行的工业主义现代性(modernity, 近代性)的爆发时期则相对较晚,大约是在工业革命进行的十八到十九世纪。特别是最近在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与以无机能源(mineral-based energy, 煤炭)、机械化大批量生产等为核心的近现代资本主义

工业革命相联系而展开相关的论述。究其原因是因为现代国家是在经历了作为现代产业起源的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工业革命是指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停滞的传统经济向近现代工业经济变革的过程,它实现了生产量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主流的西方学界在缺乏东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的情况下,认为欧洲近现代的霸权即“现代文明”是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并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和移植。这种观点认为“从英国中部地区和苏格兰几个低地区域开始的工业革命,很快就传遍了欧洲大陆,并传到了美国。到了十九世纪末,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和殖民地的经济,之后扩散到了日本等非西方国家”^[1]。基于同样的原因,欧洲-马克思主义者(Euro-Marxist)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认为经济的现代化“从英国的农村到英国的全境,再到西欧的全境,再到整个欧洲,最后到了整个世界,规模不断扩大”,詹姆斯·布劳特(James M. Blaut)将他的观点命名为以欧洲为中心的扩散主义(传播论),并进行了反驳^[2]。根据杰克·古迪(Jack Goody)的说明:布劳特以扩散论的事例解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信念,主张制造欧洲扩散主义的就是殖民主义。他认为扩散主义概念在十六、十七世纪与欧洲殖民化一起形成了理念,在殖民统治巩固的1870年代出现了古典形态^[3]。本文在近现代世界经济(现代世界体系)的层面,将对以“比较经济史”为论题展开的西方模式、工业革命、扩散主义(diffusionism)、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等概念和理论进行探讨。

1 工业革命与扩散主义

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即西方式单一普遍性的现代世界体系,与对现代地缘政治和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起着巨大作用的文明等级意识形态的确立具有相同的历史渊源。特别是经济现代化的扩散主义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即将世界各地的人类集团分为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等文明等级论也有共生关系^[4]。通常,西方学界的主流理论认为自十六世纪以来,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等各个方面都比东方具有优势。东西方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从十六世纪初开始产生差异,到了1820年左右,差距变得非常明显。举个浅显的例子,英国经济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把世界分为西欧(西欧、北美、大洋洲)和非西欧(亚洲、拉丁美洲、东欧、非洲)两个经济圈,并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比较了两个经济圈的国民所得,比较的结果是1500年西欧753美元、非西欧538美元,1820年西欧是1,202美元、非西欧580美元^[5]。但是,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认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西方)最后一位承认欧洲在各国财富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姗姗来迟者的社会理论家”^[6],我们不应忘记这段话所阐释的意义。

工业革命是使欧洲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以及引发东西方“大分流”的世界性大事件。这个大分流理论的主旨是,近现代西欧在经过工业革命而采用“资本密集型

(capital-intensive)生产方式”的同时,东洋却依然停留在“劳动密集型(labour-intensive)生产方式”阶段,两者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增大。经济史学者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认为在西方发展模式,固定资本在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追溯他所说的西欧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历史,在工业革命以前,流动资本在生产中起了主要作用,并且手工业和商业之间无法进行明确的区分,这种经济是商业经济。这种商业经济的发展达到顶峰以后,就会向固定资本投资方式转变。商业经济不仅在欧洲,在印度和中国也存在,可是通过大量固定资本投资到机械设备和工厂建设上的国家却只有英国,只有在英国出现了近代(现代)工厂式的生产方式,并导致了工业革命^[7]。

大分流理论对工业革命的原因(动力)和时点进行了探讨,并引发了学界的争论。工业革命导致了十九到二十世纪史无前例的东西方发展的不平等、不均衡,从这一角度出发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事实上,西方模式指的是近代初期以英国的经验为基础的现代化(近代化)过程,“这种模式(英国模式)表现了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成功转变,而这个转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8]。并且,工业革命成为了西方在经济和军事上凌驾于东亚之上的决定性契机。结果,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沦落为了西欧列强的殖民地,至今为止西欧建立的世界秩序依然在发挥作用。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象征着西方发展模式的工业革命是依靠欧洲社会内生的(endogenous)潜在能力而取得的成果,是欧洲独有的现象。经济史学者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曾说“人类社会积累的知识形成爆发性的推动力,史无前例地全面迅速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情况迄今为止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和之后不久的西欧”^[9]。

事实上,大分流是加州学派的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自己的著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2000)中,为了批判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陈述而提出的概念。这个词汇指的是近现代经济史上,东西方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拉开差距的决定性时期(分界点)。把欧洲(西欧)普遍主义(European Universalism)内化的学者们认为,十八世纪中后期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由于全面的“内在原因”而在欧洲兴起的。他们还把欧洲和世界其他区域的繁荣发展联系起来,主张大分流是在十八世纪的某个时点发生的。他们又在历史的原因层面从多个角度对近代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与欧洲、英国的必然联系进行了阐述。概括一下的话,其中提到了政治稳定、将新大陆和亚洲联系起来的国际贸易、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金融革命、公司的出现、科学技术、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 勤劳革命)、小生产者解体、中间阶级和富农的壮大、农业革命、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贵族阶层参与经济活动、煤炭等多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要因^[10]。

但是, 导致工业革命发生的最本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社会科学界来说, 这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谜题。在众说纷纭的相关学说中, 最为著名且至今依然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是制度主义学说, 该学说认为本质原因是因为近代初期英国社会经济活动的自由度不断扩大, 并明确了所有权制度。这种从制度层面解释原因(制度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包括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他们认为, 1688年英国以光荣革命为契机, 限制了议会、法院任意没收国王财产的侵害行为, 从而打下了保障个人所有权(包括创意的特许权)的制度基础; 减少了市场的交易费用, 形成了对于投资、贸易、创新等经济活动的激励(incentive), 从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11]。

近来莫基尔的《增长的文化: 现代经济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2017)出版以后, 从文化层面进行解读工业革命最本质原因的热情高涨了起来。持这种文化主义观点的主要是戴维·兰德斯(David S. Landes)、莫基尔等。经济史学者兰德斯认为, 过去一千年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在于“西方文明及其扩散(传播)”, 他从“研究与开发、创意能力与想象力、进取精神”^[12]等文化的因素中找到了英国人成功推动工业革命的原因。同时指出制度也是文化的产物^[13]。莫基尔主张文化的作用, 即能够为人的行动带来改变的信念、价值、偏好是决定性的要素。近代的经济发展(工业革命)是文化构成要素急剧变化带来的结果, 最重要的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全方位的认知革命, 即“启蒙主义时代有用处的知识(useful knowledge)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开始了”^[14]。同时他阐述认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科学革命推动了这种认知革命(启蒙主义)。

莫基尔认为工业革命在西欧发生的原因是知识分子们对“实用的(有用处的)知识”戏剧性的态度变化。当时通过跨国的交流, 书信共和国即精英(文化企业家)集团形成的知识交流与积累对革新起到了主要作用, 这种情况不仅在英国在西欧全境都非常普遍。同时, 针对诺斯的制度主义, 莫基尔站在批评的立场上指出“制度形成更好的市场、更加协作的行动、更有效率的分配, 但这些本身无法带来近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无法说明, 十八世纪以后在欧洲发生的创新性的技术与革新。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推动了工业革命的爆发, 从最初它就不是因为制度的刺激而产生的”^[15]。这种文化的解读方式与诺斯和阿西莫格鲁将制度视为文化原因的制度主义相比, 可以看出其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

至此, 需要关注一下1970年代出现的原工业化理论。这个理论把正式工业化的工业革命之前称为“原工业化时代”。它试图从都市手工业生产(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农村纺织工业(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及今天称为工业革命的都市工厂制机械化(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过程的农村纺织工业, 即从农村手工业中找到工业革命的形成原因。但是, 它并没

能从农村手工业中找到向近代过渡的经济动力, 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大陆和亚洲都出现了, 因此这种理论的正确性显著降低了。这种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富兰克林·门德尔斯(Franklin F. Mendels)将法国弗兰德斯亚麻纺织业作为十七到十八世纪西方“原工业化”的研究模型, 他注意到欧洲大多数地区的都市附近的农村家庭开展的手工业(织物)生产在不断增多。

根据门德尔斯的研究, 在农村工业扩大的地区, 随着人口抚养能力的提升和女性结婚年龄的降低, 人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现象, 农民以远距离的市场为目标实现了生产的专业化。并且, 人口的增长加大了劳动力的供给, 工资继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这些都有利于扩大家庭手工业, 形成了良性循环和对农村手工业有利的条件。门德尔斯认为, 十九世纪实现了都市工业化的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原工业化的阶段^[16]。他通过提出“包出制(putting-out system)收益递减说”说明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向近代工厂制工业化的过渡情况。其主要观点是, 批发店和生产流程之间的空间距离、生产者的欺骗或是交货延迟、宽泛的生产权带来的商品集货费用大幅增加等原因导致了拐点的出现, 与之相比劳动力集中在一个场所进行生产更为有利, 从而迎来了工厂制的时代。

以上所讨论的学说各成体系, 都曾经风靡一时, 但因为反对意见和相反的例子也不少, 所以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2000年代中后期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进行了经济层面的解读, 即从资本主义技术进步机制的角度提出了工业革命论, 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加州学派的主要成员从全球史比较研究的角度对艾伦的大部分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艾伦采纳了部分制度说、文化说的理论, 同时认为如果未满足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经济条件, 一个国家的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并且, 他批判地指出, 制度说、文化说的理论关注的是经济主体对一定激励措施的敏感反应, 但是激励措施又不可能超越时空, 对所有的国家都起到相同的作用^[17]。更何况,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亚洲, 制度、文化对于技术革新所起的作用并没有差别。

结果, 与其他地区不同的英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对技术革新的需求和技术革新的收益性。艾伦分析认为“如果要解释工业革命, 应当从英国独特的工资和价格组成中去寻找原因。在以高工资和廉价的能源为基础的英国经济中, 企业发明和使用引起工业革命的革新技术是有益的”^[18]。换言之, 随着当时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 英国经济特有的高工资、廉价能源在形成劳动节约型的同时, 为偏向于资本、能源消费的技术进步提供了激励。另外, 艾伦虽然承认英国的羊毛工业, 即农村手工业的重要性, 但把它作为了工业革命间接的推动因素。他从经济层面的解释认为, 从英国以资本、能源代替高工资劳动的对应论题的角度看, 未伴随工资水平上升的原工业化论并没有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发生。

事实上, 如果要探究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的推动力量(原因), 那么就需要能够解释清楚“欧洲历史上的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和“世界历史上的大分流”的理论基础。这样的话, 艾伦提出的经济层面的解释即资本主义的“偏向性(侧重性)技术进步(biased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理论是比较有意义的。他所设计的技术进步机制分为重商主义→城市化→高工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阶段。在工业革命的历史上, 英国的高工资、廉价能源对于朝向机械化的技术进步偏向性(biasedness)起了主要作用。艾伦将英国的高工资和廉价能源归因于快速城市化, 并以在欧洲、世界市场上起到海上贸易据点作用的伦敦等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扩张为例说明了情况。简而言之, “首先, 城市的发展与农村的羊毛工业一起, 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因此, 英国的工资从十七世纪开始持续上涨, 尽管其人口增长率高于欧洲大陆。其次, 由于城市的发展导致木材和木炭的短缺, 能源价格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急剧上升, 英国经济从木材和木炭转向低成本能源——煤炭, 用其替代作为主要能源”^[19]。

近来学界根据艾伦的分析框架, 对十八到十九世纪的历史分流进行重新考察和研究取得了进展。如果说到小分流的话, 法国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荷兰虽然具备了高工资的条件, 但是缺少廉价能源的条件, 因此工业革命的发生延迟了。而比利时两个条件都具备, 所以继英国之后第二个成功爆发了工业革命。另一个方面, 用艾伦的分析框架来看大分流的话, 英国的高工资、廉价能源为偏向性技术进步提供了巨大的激励, 中国的情况与之相反, 对成为近代工业国家十分关键的工业革命缺乏相应的经济刺激因素。中国具有的是廉价、丰富的劳动力和高价的能源, 完全不具备对偏向性技术进步激励的前提条件^[20]。在大分流的层面, 艾伦将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应用到十九到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历史, 诊断认为“在更高的工资条件下, 西方先进国家开发出了节省劳动力的技术, 通过这些技术走上了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发展轨道, 这种循环不断重复。今天, 贫困的国家丧失了这样的发展机会。在这些国家, 工资水平低而资本费用高, 还在使用过时的技术进行生产, 因此收入也低”^[21]。

概括总结一下的话, 就是西方先进国家在高工资→节省劳动的技术进步→高工资的良性循环下不断发展, 与此同时非西方的落后国家陷入了低工资→技术进步停止→低工资的恶性循环, 从而形成了世界巨大的贫富、技术差异。

2 结论

回首过去, 以二十世纪末中国的政治经济崛起以及伴随的东亚区域社会的登场为契机, 于世纪交替期的2000年前后在美国形成了加州学派。从区域性全球史的宏观角度, 他们通过精巧的论点和量化的论证否定了以往世界史上公认的理论, 从根本上使现代西方霸权的历史必然性土崩瓦解。特别是这种修正主义潮流与中国的快速崛起是紧密相关的。从1990年代末开始,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对美国发起了挑战, 在从历史的角度对此进行解读的同时, 形成了对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史进行全面的再探讨的潮流。属于东亚圈的中国、韩国等的经济增长未对西方中心论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但因为中国是能够对欧洲和美国造成威胁的文明大国, 所以对此的认

识就不同了。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崛起要求西方对其单向(单线)论的历史观进行反省。西方社会今天的富有和优越不是先天就具有的或是一种例外, 而是在近现代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发生的, 也只不过是过去二百年间的事情罢了。

【参考文献】

- [1](美)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韩)金民柱、李烨译,首尔:EcoLibres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 [2](美)詹姆斯·布劳特(James M. Blaut):《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的陷阱》,(韩)朴光植译,坡州:青林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 [3](英)杰克·古迪(Jack Goody):《资本主义是欧洲独有的产物吗》,(韩)孙暎来译,首尔:龙的林,2016年,第98页。
- [4] 参阅刘禾(Lydia H. Liu)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 [5] Angus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70-71.
- [6](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2021年重印),第15页。
- [7](韩)姜玟亚:《中国的崛起和世界史的重新审视:从加州学派到全球霸权论》,载《历史与边界》2011年第80辑,釜山庆南史学会,第153-154页。
- [8]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 [9](美)乔尔·莫基尔:《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第463页。
- [10](韩)李永石:《工厂历史:近代英国社会与生产、语言、政治》,首尔:青史出版社,2012年,第52-60页。
- [11](韩)安宗奭:《对英国工业革命原因争论的批判性检讨和“大分流”的重新审视:制度、文化性解释的局限和经济性解释的挑战》,载《社会与历史》2014年第103辑,韩国社会史学会,第352-354页。
- [12](美)戴维·兰德斯(David S. Landes):《国家的财富和贫穷》,(韩)安振焕、崔素英译,首尔:韩国经济新闻,2009年,第346页。
- [13](美)戴维·兰德斯:《国家的财富和贫穷》,第349页。
- [14](美)乔尔·莫基尔:《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第22页。
- [15](美)乔尔·莫基尔:《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第25页。
- [16] Franklin F. Mendel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1, 1972, pp.241-261.该原工业化工业为工业革命提供的有利条件可以列举为以下几点:“第一,在农村工业发展过程中,商人、地主、企业家积累的资金成为引发工业革命

所必要的资金。第二,从生产手段中解放出来的近代工人,并不是由于圈地运动从农村向城市的移动中产生的,而是在农村工业区内准备完成的。第三,随着农业近代化与农村工业化同步进行,工业革命以后,在粮食供应方面成为支持城市工业人口扩大的基础。第四,农村工业成为近代工业工人基本技能培训的场所。第五,通过原工业化,商人积累了经营管理和营销方面的经验。”(日)齊藤修:《プロト工業化の時代》,東京:日本評論社,1985年,第262-263页。

[17]Robert C.Alle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s a problem in global histor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689,2013,pp.2-3.

[18](英)罗伯特·艾伦(Robert C.Allen):《全球经济史》,(韩)李康国译,坡州:文学村(蛟犹书架),2019年,第49-50页。

[19](韩)安宗奭:《对英国工业革命原因争论的批判性检讨和“大分流”的重新审视:制度、文化性解释的局限和经济性解释的挑战》,第366-367页。

[20](韩)安宗奭:《对英国工业革命原因争论的批判性检讨和“大分流”的重新审视:制度、文化性解释的局限和经济性解释的挑战》,第376-381页。

[21](英)罗伯特·艾伦:《全球经济史》,第82页。